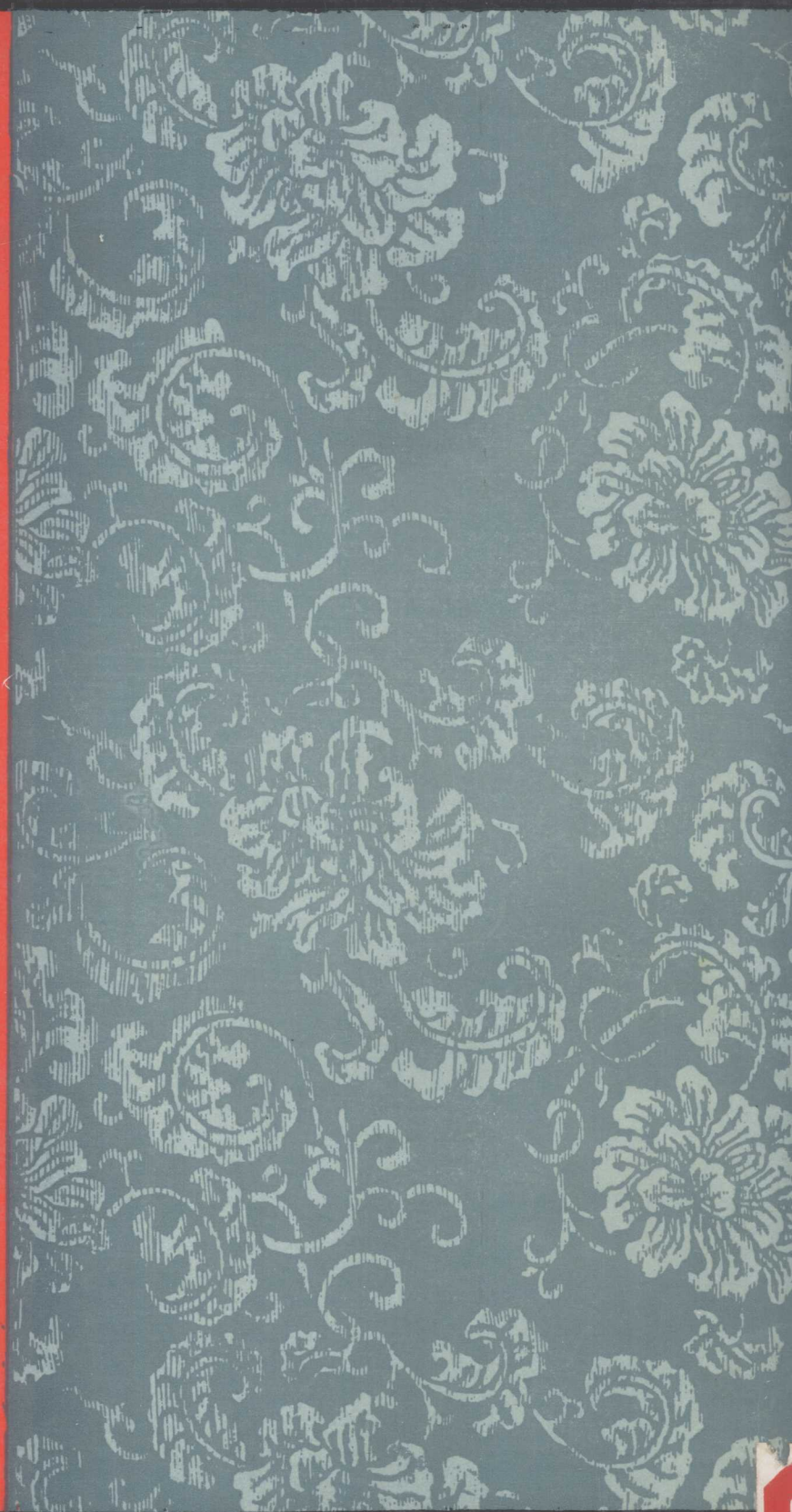


黃錫全 著

汗簡注釋



黃錫全 著

汗簡注釋



武漢大學出版社

汗簡注釋總目

一	李學勤先生序	一
二	自序	四
三	凡例	二四
四	主要參考書目及其簡稱	二七
五	汪立名序	三三
六	李建中題記	三三
七	郭忠恕於卷首序	三三
八	汗簡書目注釋	三四
九	汗簡古文注釋	六四
	卷一	六四
	卷二	一五七
	卷三	二二二
	卷四	三一〇
	卷五	三八六
	卷六	四四七
十	汗簡古文補遺	五一

十一 汗簡卷第七 略叙 目錄 五二二

略叙 五二二

目錄 五二七

十二 李直方後序 五三六

十三 鄭所南跋 五三七

十四 七十餘種資料時代字數統計表 五三八

十五 後記 五三九

十六 檢字索引 五四一

序

郭忠恕《汗簡》一書，自著成以來，罕有知音。當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目解題》等目錄，均不載此書，可見流傳之少。現在所能見到的，祇有明清之際馮己蒼校本及清汪立名一隅舛堂刊本，後者是據潛采堂朱氏藏校本上梓的，說明此書長時期僅以抄本存世。至於研究《汗簡》的著作，更屬鳳毛麟角。黃錫全同志從學於于省吾先生，所著《汗簡注釋》即將出版，這是我國古文字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

《汗簡》書題已表明其中所列文字來自古代簡書。西漢時期曾有兩次出現先秦簡書，給學術發展帶來重大影響。第一次是在漢惠帝除挾書令後，北平侯張蒼獻出的《左傳》；第二次是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在壁中發現的《尚書》等竹簡。這兩批簡書都是用不同於漢代通行字體即所謂「古文」寫的，屬於當時說的「古文」。

漢人所說「古文」，原意是古代也就是秦以前的文字，但在具體應用時，此詞涵義有時較狹。原來在漢代，人們所能接觸的秦以前文字是很有限制的，雖說山川時出鼎彝，其銘文殊少流傳，學者的知見主，要是上面說的簡書。這些書籍本為秦代遭禁的六國寫本，用的是六國字體，因此漢代「古文」基本上是指這類字體而言。時人以為孔子壁中書便是蒼頡以來文字，《說文》敘強調「孔氏古文」即反映了這一點。

當時又有《史籀》十五篇，傳為周代史官教學童書，乃宣王時太史籀所作，稱為大篆，是秦漢小篆所從出，「與古文或異」。秦書八體首列大篆，是因為以秦文統一文字，「古文」在排斥之列。漢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

以八體試之，亦沿秦代之舊。到王莽時改八體為六書，首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次為「奇字」，即「古文而異者」，「說文」也列有「古文」，「籀文」，從此「古文」成為一種字體傳習研究。曹魏正始三體石經有「古文」，仍是「尚書」，「左傳」，足見淵源有自。自漢至唐，「古文」之學實際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內涵。西晉汲冢竹書出土，能有不少學者整理釋讀，無疑是以「古文」之學作為憑藉。

《汗簡》作者鄭忠恕，洛陽人。七歲時即應童子科及第。後漢隱帝時任徐州節度使劉贊從事，因與人爭事辭去。後周太祖時，為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後改《周易》博士。世宗時，曾授《古文尚書》及《釋文》。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一年），因被酒喧競朝堂，貶為乾州司戶參軍；又以毆人、擅離貶所罪名削籍，隸靈武。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公元九七六年），召為國子監主簿，命刊定歷代字書。次年，即因得罪宦官，以「諱謫時政，擅離官物」，詔減死決杖，流配登州，死於途中。他的著作除《汗簡》外，還有《佩觿》傳世，書畫亦甚聞名，有關材料可看陳高華同志《宋遼金畫家史料》二十二。從鄭忠恕事迹知道，他精於《古文尚書》，通悉歷代字書，這正是撰著《汗簡》的條件。

《汗簡》一書，結集眾說，可以說是「古文」之學的總結，然而「古文」之學的傳流至此也就告一段落。北宋時期，商周金文的搜集研究大盛，「古文」被其掩蓋。到清代，《說文》之學風行，金文研究日益深入，以《汗簡》為代表的「古文」，被認為上不合於商周，下有悖於《說文》，受到不應有的蔑視。惟一專門研究此書的，是光緒時刊刻的《汗簡箋正》，其作者為遵義鄭珍，但他生前實未完稿，是由子鄭知同補完的。如同在序中說：「先君子為古篆籀之學，奉《說文》為主臬，恆苦後來潤

亂許學而偽託古文者二：在本書中有徐氏新附，在本書外有郭氏《汗簡》。『這段話可為一班《說文》學家態度的代表。』

近二十餘年來，在古文字學中興起了一個新分支，即戰國文字研究，六國「古文」的興蘊逐漸被重新揭示出來。通過戰國文字研究的開展，前代「古文」之學得到重新評價，《汗簡》的真實價值也為人們所認識。過去王國維先生指出《說文》「古文」係六國文字，現在我們不妨說《汗簡》「古文」確以六國文字為其本源。

黃錫全同志這部《汗簡注釋》，根據近年戰國文字研究積累的成果，對郭書條公縷析，與鄭珍《箋正》相比，自有根本的不同。相信《注釋》問世後，大家會進一步利用《汗簡》，使戰國文字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績。

李學勤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自序

《汗簡》是北宋初年郭忠恕彙集的一部「古文」字書。書名取自古人「殺青簡」以寫經書，謂之「殺青」，亦謂「汗簡」，借以標明書中「古文」的淵源，說明「古文」是來源於古人於竹簡上所寫經書的文字。書中正編「古文」六卷，後有「略叙目錄」一卷，共七卷。正編前有郭氏序言。正編收字是每字一體，正文是篆書古體，釋文為楷書。錄字採用《說文》、《分別部居》、《始一終亥》的原則，把收集的「古文」、「據形繫聯」，使其「不相間雜，易於檢討」。在一部之內的文字次第，基本是「以《尚書》為始，石經、《說文》次之，後人綴輯者殿末焉」。今本《汗簡》存二千九百六十一字，本注釋增補《周才字錄》一字、部首二十八字，又於正編末尾補出《古文四聲韻》中注出《汗簡》而今本無者八十三字，計得三千零七十三字，估計原書收字可能超過此數。

《汗簡》的資料來源甚廣，收錄甚豐，不論字數多少，祇要郭氏認為是「古文」者，均一一採錄。徵引的七十一種資料中，少者僅錄一字，如玄德觀碑、《鳳栖記》、陵敵臺銘、蘇文昌《奇字集》；多者數百字，如《古尚書》、《義雲章》等。據統計，十字以下的有四十九種，百字以下的有十三種，百字以上的有八種。除《說文》、石經、碧落碑等幾種資料外，其餘者多已失傳。

正編中每字同一古文，因偏旁有些差異，而郭氏將其分列不同的部。全書三千餘字，汰其重複，約存單字二千四百餘。古文與楷書的形體結構很多是相符的，如「方、夙、夙、𠂔」，即長、丙、旁、趨。但有相當一部分古文與楷書不是一字，這

當是郭氏於卷首所說的，「於本字下直作字樣之釋，不為隸古，取其便識」。其中很多是假借字。

《汗簡》輯成之後，在當時就不多見。李建中（公元945-1013年）曾對此書作過「刊修」，所謂「秘閣新本」，就是經他整理過的刊修本。天禧二年三月（公元1018年），李直方又據「刊修」本抄寫。現在流傳的本子，有清初馮舒（字已蒼，又號癸巳老人）藏抄本和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又號樞舫）藏抄本兩種。《四部叢刊》本即據馮本影印，朱本在清康熙時被汪立名刻印成書。這兩個本子實際同源，乃是來源於李直方手抄李建中的「刊修」本。馮本《跋》說，他所據之本是明崇禎十四年「借之山西張孟恭氏」。又說，「此書向無刻本，張本亦非曉字學者所書，遺失謬誤，未可意革」。《宋史·李建中傳》（列傳文苑三），李建中字得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為楷法。曾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由此可見，郭氏所輯之原本與李建中「刊修」過之「新本」已有差別，李本又經後人輾轉傳抄，遺漏錯誤之處是可以想見的。儘管如此，該書能流傳至今已是難得。

《汗簡》問世以後，夏竦於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在此書的基礎上，擴大收字範圍而成《古文四聲韻》，其中與《汗簡》同者多抄自《汗簡》。杜從古又在《汗簡》與《古文四聲韻》的基礎上，擴大收字範圍而成《集篆古文韻海》。因此，研究《汗簡》，夏、杜二氏之書是兩部重要的參考著作。

雖然宋人的有關目錄書中祇著錄郭氏的《佩觿》而未提及《汗簡》，直至元代輯成的《宋史·藝文志》才載有《汗簡集》七卷，但是該書對後來金石學的興起，「古

文」的流傳、字書的編纂等方面無疑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也曾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如北宋真宗時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亦即手抄李建中「刊修」本《汗簡》的李直方就認為，「結繩之後，倉頡、史籀製作已來，三王興霸國文字或有異同。始皇兼天下，李斯為小篆，可謂至哉。而遭秦之所劫者，盡在此矣」（《汗簡》李直方述）。夏竦公於《古文四聲韻》序中說，「周之宗正臣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向中正，刻《考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為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呂大臨在《考古圖釋文》序中認為，其古文「傳於今者，有《古尚書》、《考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鄭所南《汗簡跋》云：「觀其原委，深有自來。」又云：「《汗簡》之作，追古法於既泯，流新傳於無窮，郭公之功多矣。」汪立名《汗簡序》云：「郭宗正《汗簡》，見《宋史·藝文志》，與《佩觿》並列，自夏英公《集古文韻》而下，凡小學之書亡不援據。」羅振玉影印《古文四聲韻》題記云：「郭氏《汗簡》，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並為考究魏晉以後所謂「古文」之要書，蓋「古文」遞變之迹，由此可上溯許書及古彝器銘沿流以得源。」王國維認為「郭忠恕輩之所集，決非其所自創，而當為六朝以來相傳之舊體也」（《魏石經考五》）。可是，對於《汗簡》的真偽及其學術價值並不是沒有疑義的，有不少學者提出過懷疑，或者否定。如清代考據大家錢大昕就認為，「郭忠恕《汗簡》，談古者奉為金科玉歷，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見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吳大澂也認為《汗簡》、《古文四聲韻》「援據雖博，蕪穢滋疑」（《說文古

籀補敘》。唐蘭先生曾認為，「從漢到宋初，除了篆籀和竹簡古文外，祇有杜撰的古字了。郭忠恕做《汗簡》，是這一個時期的結束」(《古文小學導論》)。他又認為夏竦援《古文四聲韻》的「本意是集錄這些材料以備研究鐘鼎文字，但結果這些材料，大抵不能用」。吾邱衍也認為象夏韻這類材料「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學古編》)。鄭珍的《汗簡箋正》，是第一部系統而全面研究《汗簡》的專著。他對《汗簡》徵引的「書目」分別作了考證，在利用夏韻校正《汗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對有些「古文」的論證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參考著作。但是，鄭珍作《箋正》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批判《汗簡》；是為了說明《汗簡》所引「古文」，除石經、《說文》而外，其它無足憑信。鄭珍之子鄭知同在其《汗簡箋正·序》中就明確指出：「先君子為古篆籀之學，奉《說文》為主臬，恆苦後來溷亂許學而偽託古文者二：在本書中有徐氏所附，在本書外有郭氏《汗簡》。」《汗簡》之不經則異是，其歷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說託，務為僻怪，以炫末俗。」「先君子所為，抉其底蘊，為之箋正。」的確，鄭氏的《箋正》中對《汗簡》徵引的其它古佚書往往妄加誣語，駁難郭氏的按語在該書中到處可見。

《汗簡》之所以能够引起學者的興趣，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是與先秦古文字的不斷出土，特別是戰國文字的不斷發現分不開的。經過歷代學者的潛心研究，使我們認識到古文字的演變規律，尤其是戰國文字形體「奇詭」的特點與漢魏以來傳世「古文」有密切關係。儘管這些「古文」形體有譌變，祇要能找出其與先秦古文字的對應關係，演變軌迹，就能肯定它是來源有據的，可信的，也能利用這些「古文」去釋讀先秦古文字。如劉心源據《汗簡》錄《義雲章》姪作體，釋金文(蘇甫人匹)、甬(嬀姪壺)等

禮(《說文》所無)字為姪(《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八)。羅振玉在《古璽文字徵》之序言中就列舉了一些古璽文與《汗簡》「古文」合者，說明《汗簡》對於認識古璽是很重要的參考著作。思泊師曾據《汗簡》錄王存父《切韻》鬱作鬱司，進一步證明陳夢家所釋金文之鬱(叔苴)、鬱(小子生尊)、鬱司(孟獻父壺)等字為鬱是正確的，並考證甲骨文之鬱亦應釋為鬱，指出《汗簡》之鬱乃是譌父為去，譌司為司(釋林)。張頴先生據《汗簡》報作鬱，讀中山王鼎「五年復吳」為「五年報吳」(張守中《中山王璽器文字編·序》)。袁錫圭先生據《汗簡》、《玉篇》等釋鬱盤之鬱為鬱之古文，借為鬱，訓鬱(《文物》1978.3)。李學勤先生在各地講學時曾多次指出《汗簡》、夏竦對古文研究的重要性(參見《山西文物》1982.1)。何琳儀同志所撰《汗簡》、《古文四聲韻》與古文字的關係一文(碩士論文)，具體闡述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舉例說明了一些問題。象這些具體的引證分析，使對《汗簡》的認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時也說明了《汗簡》這類傳世的「古文」資料不僅有參考價值，而且對古文字的研究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本《注釋》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所作的一項綜合而帶有探索性的工作，試圖通過利用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結合古代典籍及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弄清《汗簡》徵引資料的內涵、「古文」形體結構的演變或譌變關係及其得失，並解決一些《汗簡》與古文研究中的疑難問題。

那麼，《汗簡》一書究竟是怎樣產生的，來源於甚麼性質的文字資料，包含哪些內容，有多大價值，存在哪些缺點和錯誤呢？經過作者的分析研究，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方面的認識：

一、先秦「古文」流傳至唐宋沒有間斷，郭忠恕編纂《汗簡》絕非偶然

一部「古文」字書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古文」的流傳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追溯先秦「古文」流傳至唐宋的大致脈絡，《汗簡》中「古文」的來源及該書的形成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知道，儘管用古文字書寫的先秦典籍經秦始皇的「焚書」遭到了嚴重的燬壞，但「古文」的流傳並沒有因此而絕迹。秦滅以後不久，漢初惠帝時就「除挾書之律」（《漢書·惠帝紀》），武帝「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序》）。許多已亡佚的先秦古書，漢初便陸續發現了。如「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說文解字·叙》）。因這些書籍都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叫做「古文經」，當時理所當然的皆充中秘府。除此之外，漢時幸存的，可能是籀文的，還有《史籀篇》（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叙錄》）。杜林在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杜林傳衛宏，衛宏作《古文官書》一卷（《後漢書·杜林傳》）。後來，古文經學者許慎作《說文解字》，「叙篆文合以古籀」，保存了很豐富的文字資料。

古文經到漢末時，估計中秘所藏已有散佚，但外間仍有抄本流傳。如魏初邯鄲淳傳古文，有《古文尚書》寫本，正始年間刻成三體石經，保存了不少「古文」。又稱「科斗文」（衛恒《四體書勢》）。晉時發現的魏襄王墓，出竹書七十五卷，有《周易》、《紀年》、《論語》、《穆天子傳》等古文文字材料（《晉書·束皙傳》）。南齊時雍州發現竹簡，有《考工記》。梁時任昉得一篇殘缺的《古文尚書》刪逸篇等（見唐蘭《古文小學導論》）。可見，這類古書在唐以前是常有發現的。雖然竹簡不易保存，但有臨摹傳抄本傳世，如李陽冰就有《古文考經》與《古文官書》合為一卷（見《汗簡·略叙》）。孔子壁

中書出來以後，孔安國有隸古定本傳世。這個本子到唐時纔亡。晉時出現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也是用隸古定字寫的，流傳至今的唐人寫本中就有不少古體字。

漢魏以降，有銘銅器也時有發現，見於著錄的如湯盤、孔涅鼎之類。大概在隋末唐初發現了石鼓文（唐初就有了拓本）。除此，還有印章、封泥、銅鏡、古璽、古陶等文字材料傳世。象這些出土或傳世的「古文」材料，或摹或拓，都會反映到當時各家收錄的「古文」字書或碑刻中，如張揮《集古文》、朱有《集奇字》、徐邈《集古文》、蘇文昌《奇字集》、《證俗古文》、馬日碑《集群書古文》、唐陽華巖銘、碧落碑等。山東高唐縣出土的金代虞寅墓誌蓋文十六字，就是用流傳的「古文」刻寫的，這些字與《汗簡》、夏竦中的「古文」大體相合，說明先秦古文經西漢至唐宋，不斷流傳，並沒有真正消亡過（《文物》1982.1）。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生於五代（具體時間不詳）。曾仕後漢。後周廣順中，為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後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爭於朝堂，貶乾州司戶參軍。秋滿遂不仕，放曠收雍京洛間。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又因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譴，被流配登州，死於齊之臨邑道中。時為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他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後來「尤工篆籀」，能書善畫（參見《宋史·列傳·文苑四》、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等）。《汗簡》就是他「莊官校勘正經石字」時精心搜求、長期積累而成。他於《汗簡》卷首中寫道：「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而下，史籀已還，爰從漁獵，得其一二，傳寫多誤，不能盡通。臣頃以小學，莊官校勘正經石字，繇是諮詢鴻碩，假借字書，時或採掇，俄成卷軸」。又於《略叙》云：「鳥迹科斗，通謂古文。歷代從俗，斯文患寡，

目論臆斷，可得而聞。太史公曰：「禮失求諸野」，古文猶不愈於野乎，亦下臣之志也。由此可見，郭忠恕不僅精心採錄中閣秘藏之材料，具有得天獨厚的寫作條件，而且又立志搜求民間流傳之「古文」，又因他「尤工篆籀」，具有較高的文字修養，流傳至唐宋的「古文」由他彙輯成書，非但順理成章，而且非常適宜。另外，他還撰有《佩觿》三卷，寫過一本小字《說文字源》（見《集古錄》今不傳），所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並行於世。

二、《汗簡》徵引的「古文」，大部分來源有據，形體結構可信，有的可補證《說文》。有的可補充石經，有的甚至可據之以考證先秦古文字。

《汗簡》徵引的七十餘種資料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流傳至今者，如石經、《說文》、《周禮》、《尚書》、《史記》、《漢書》、《周易》、《詩經》、《禮記》、《周禮》、《考經》、《莊子》、《爾雅》、《論語》、《老子》等，我們可以拿「今本」與之對照；另一類是已經亡佚者，如《義雲章》、《林罕》、《集字》、郭顯卿《字指》、裴光遠《集綴》、王庶子碑等等，我們已無法知其原貌，也不知郭氏如何取捨，祇能根據郭氏徵引的第一類材料的情況及這類材料本身的實際內容作出判斷。

第一類材料，亦即可與今存資料對照者，經過比較分析，我們基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郭氏收錄的「古文」是從傳世材料中提取的。如出土三體石經祖字古文作祖，鄭字古文作𠂔，郭錄石經祖作祖，鄭作𠂔，《說文》𠂔字古文作𠂔，為字古文作𠂔。

郭錄《說文》作𠂔，今存碧落碑天作𠂔，奉作𠂔，道作𠂔，郭錄此碑作𠂔，𠂔，衛，等等。

(二) 傳世材料的書寫形式有「古文」篆體和隸古定體，是「古文」篆體者照錄，不合《汗簡》部首者改从部首；是隸古定體，則依《汗簡》部首以隸作古，在作古的過程中參閱過他能見到的諸如石經、《說文》及當時流傳的「古文」材料。如《說文》鈕字古文作𠂔，瑁字古文作𠂔，郭錄《說文》鈕作𠂔，瑁作𠂔，變从部首所，𠂔。碧落碑作𠂔，郭錄作𠂔，變从部首𠂔，𠂔。碧落碑作𠂔，同《說文》融字籀文𠂔，郭錄作𠂔，變从部首𠂔，𠂔。碧落碑作𠂔，郭錄作𠂔，京同三體石經古文𠂔。《漢書·韋玄成傳》張敞傳中的嬌，注「古文嬌字」。《說文》嬌字古文作𠂔。郭錄《史書》情作𠂔，形同《說文》古文，而女旁从部首。《史記·司馬相如傳》中的盤字，索隱引張揖說「盤，古庚字」。郭錄《古史記》庚作𠂔，所从之卒、文、血，同部首卒、今、𠂔。古寫本《尚書》禮作𠂔，郭錄《尚書》作𠂔，同《說文》禮字古文𠂔。古寫本《尚書》冊作𠂔，郭錄作𠂔，同《說文》冊之古文𠂔。古寫本《尚書》典作𠂔，郭錄作𠂔，與《說文》古文𠂔有別，而與三體石經古文𠂔類同。古寫本《尚書》穆作𠂔，郭錄作𠂔，與《說文》正篆穆有別，而與碧落碑𠂔形類同，等等。

(三) 有不少「古文」是今天難以見到的材料，也有比今本更原始的材料，可供研究先秦古文時運用。如編中注出石經的「古文」有一百四十一字，其中有四十八字不見於出土的石經和《隸續》所錄之石經。這些字無疑是非常珍貴的材料。如露作𠂔，同古靈用各，生作𠂔，同望山楚簡生，𠂔。法作𠂔，同《說文》古文𠂔。郭氏所錄之《說文》，有的則是出自今天見不到的異本。如郭錄《說文》教作𠂔，即鈺本

數字古文𠂔，又錄𠂔，注云「一本如此作」，而鉉本有古文𠂔無𠂔。郭錄《說文》𠂔作𠂔，注「見舊說文」，鉉本𠂔字古文作𠂔，字形有別。郭錄青作𠂔，又錄𠂔，注云「一本作此字」，鉉本青字古文作𠂔，不如上列二形更接近古體。象這類字，有的可校正今本，有的可補充今本。變與𠂔古本一字，甲骨文作𠂔，金文變作𠂔，𠂔，古靈作𠂔，省作𠂔。郭錄《演說文》𠂔作𠂔，顯係𠂔，而今本無此形。甲骨文有𠂔字，古靈變作𠂔，舊不識，郭錄碧落碑社作𠂔，形體相合，上列之字當據此釋為福社之社。郭錄《古尚書》有四百多字，大部分來源於真篇的《古文尚書》，對於研究古本《尚書》是很重要的參考材料，尤其是還不見於今存古寫本的那些字。如古寫本《尚書》農作𠂔，郭錄作𠂔，《說文》、金文、戰國文字中目前均不見从艸之𠂔，惟甲骨文有𠂔字，《甲骨文編》列入農。郭錄《尚書》靈作𠂔，不見於古寫本。《玉篇》靈同靈。靈靈音同，《尚書》當是假靈為靈，省作靈。楚簡有靈字，𠂔，乃其省作。如依《汗簡》，楚簡應釋為靈。《汗簡》龍作𠂔，來源有據。郭錄《尚書》格作𠂔，與滕侯戟之𠂔、蔡戟之𠂔類同，而《說文》無𠂔字，也不見於今存之古寫本。另外，徵引的《古周易》、《古論語》、《古考經》等文字，也是研究其古本的珍貴資料。

後一類資料，亦即今已失傳的古佚書、古佚碑，估計郭氏收錄其中「古文」的情形與前一類類同。由於我們已無法弄清其原委，祇能根據編中的字形結構分辨其來源及得失，从中吸取可資利用的材料。經比較分析，這類材料大致包含下列幾方面的內容。

(一) 見於三體石經和《說文》
古佚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古文」見於三體石經古文和《說文》古文、籀文、